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

戈宝权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 / 江苏美术出版社编.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11
ISBN 7-5344-1192-0

I. 文... II. 江... III. 戈宝权—照片评传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108 号

责任编辑 张学成 杜 辛 郑必宽
装帧设计 卢 浩 王 俊
责任校对 刁海裕
审 读 钱兴奇 郭廉夫
监 印 符少东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 (深圳) 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2 印张 19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4-1192-0 / J · 1189

定价: 1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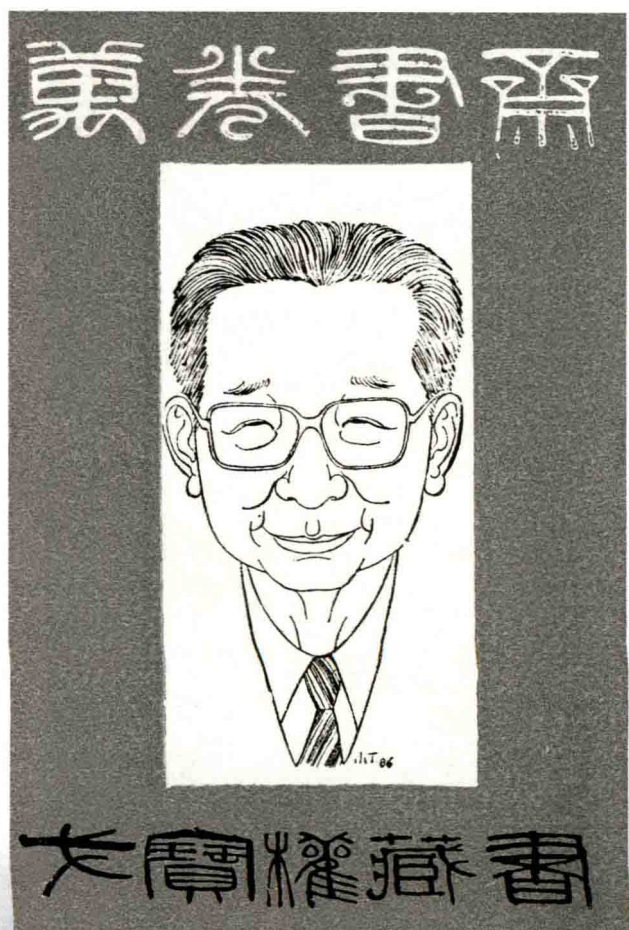
社址 / 南京市中央路 54 号

电话 / 3308318 邮编 / 210009

发行科 / 南京市湖南路 54 号

电话 / 3211554 邮编 / 210009

目录



丁聪作画 黄苗子题字(上)
钱君匋题字(下)

江泽民题词	(5)
李鹏题词	(6)
邹家华题词、启功题词	(7)
茅盾题词、胡绳题词	(8)
戈宝权——一位受尊敬的学者、长者、仁者(代序)···周巍峙	(9)
关于叔父戈公振先生及对戈宝权的启蒙	(13)
东海之子	(17)
与普希金结缘	(21)
大学生活	(27)
初入社会	(29)
莫斯科三年	(33)
黄河在咆哮	(41)
新中国第一位外交官及外事工作	(47)
法国之行	(123)
万卷书斋	(137)
新疆好地方	(149)
岁月无情人有情	(155)
故乡行	(209)
宝权,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17)
大事年表	(223)
后记	(227)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

戈宝权



江苏美术出版社

编委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梁培兰 高 云

特邀顾问：罗高寿 齐赫文斯基 库利科娃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聪 石启忠 孙 戈 孙家正

朱仲丽 华君武 汝 信 陈辉海

杨九诠 张昌华 宋林飞 沙 洲

欧阳山尊 周巍峙 季羨林 季允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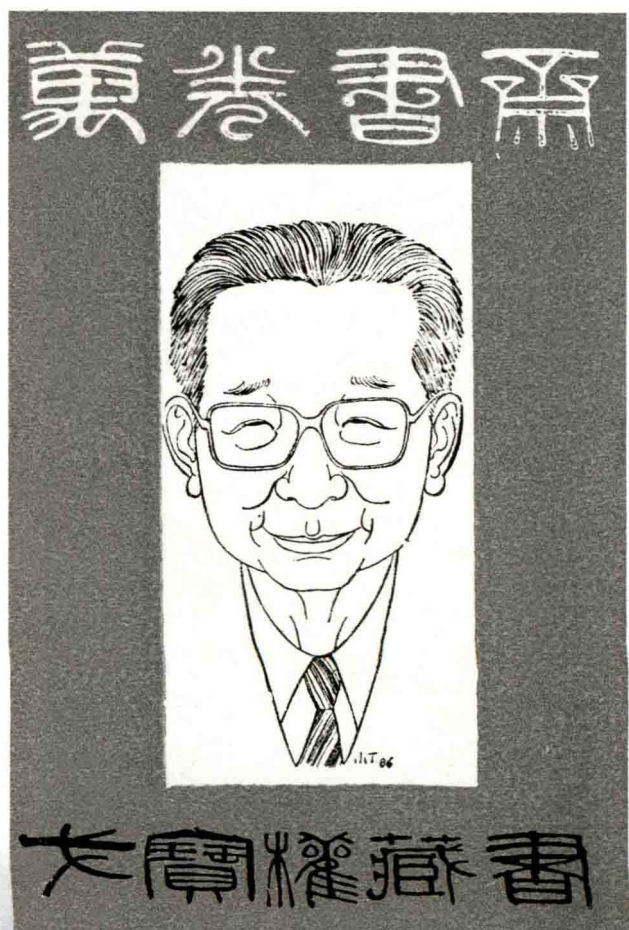
范 用 高 云 高 斯 高 莽

黄宝生 梁培兰 蒋迪安 程大利

臧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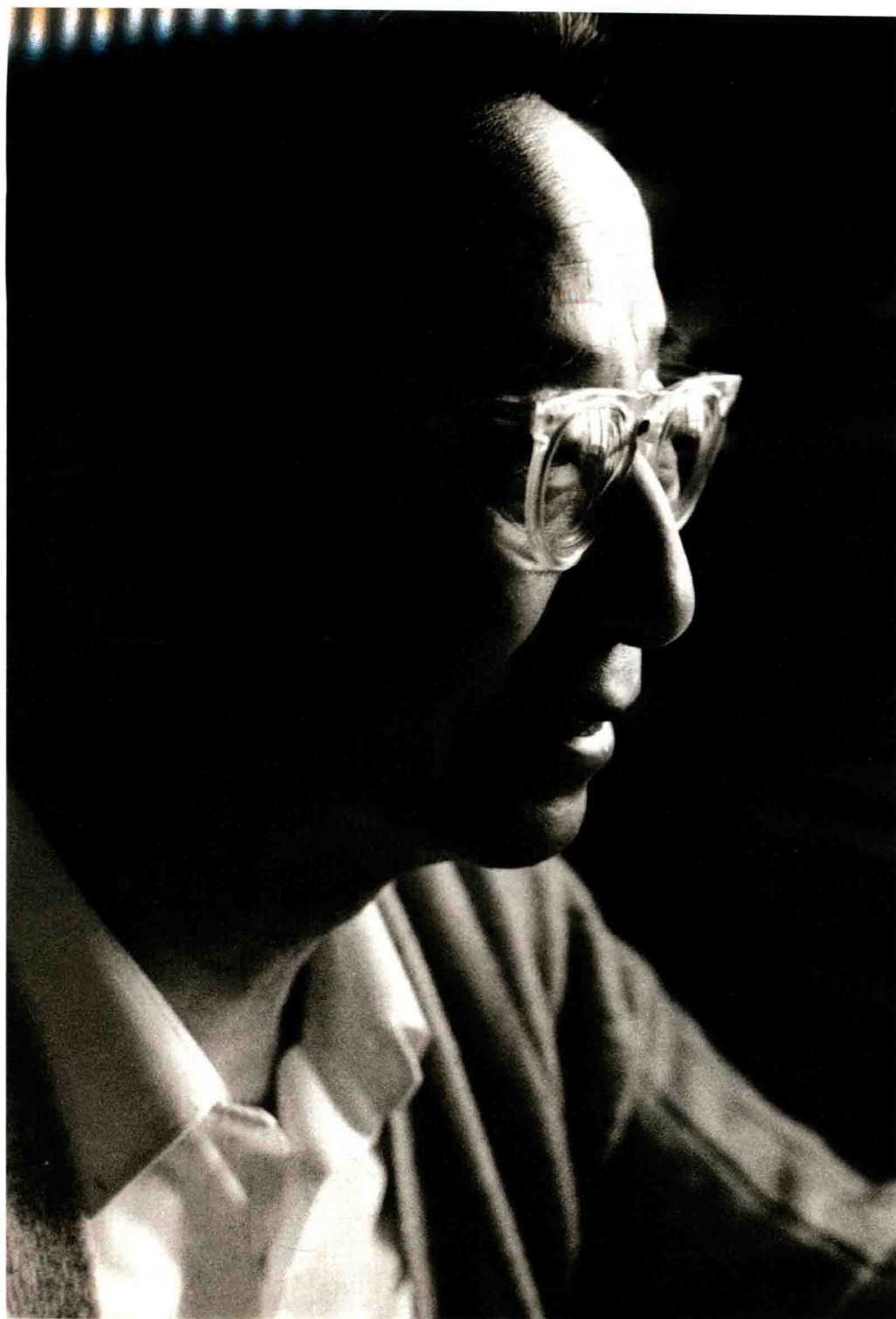
图片、文字：梁培兰

目录



丁聪作画 黄苗子题字(上)
钱君匋题字(下)

江泽民题词	(5)
李鹏题词	(6)
邹家华题词、启功题词	(7)
茅盾题词、胡绳题词	(8)
戈宝权——一位受尊敬的学者、长者、仁者(代序)···周巍峙	(9)
关于叔父戈公振先生及对戈宝权的启蒙	(13)
东海之子	(17)
与普希金结缘	(21)
大学生活	(27)
初入社会	(29)
莫斯科三年	(33)
黄河在咆哮	(41)
新中国第一位外交官及外事工作	(47)
法国之行	(123)
万卷书斋	(137)
新疆好地方	(149)
岁月无情人有情	(155)
故乡行	(209)
宝权,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17)
大事年表	(223)
后记	(227)



戈宝权(1913-2000)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

江泽民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六日

江泽民题词

传播世界文学名著
增进各国人民友谊
为戈家权同志画册题

李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人民友谊的使者

为戈宝权画册题 邹家华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邹家华题词

戈宝权

文化和人民友谊的使者

启功题签



启功题词

驢老伏櫪

志在千里

為六十年老友

宝叔同志書

胡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胡繩題詞

幾度芳菲鵲鵲一番風雨倉
庚斜陽腐草起流螢牛鬼
蛇神弄影可笑沐猴而冠
別憐指鹿盈廷五洲怒火正奔
騰齊唱東風更勁
西江月
寶叔同志書
茅盾
一九五九年元旦
北京

茅盾題詞

戈宝权——一位受尊敬的学者、长者、仁者（代序）

周巍峙

年届 86 岁高龄的宝权，正在和病魔作着顽强的斗争。他虽然长期卧床，时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但在夫人梁培兰的鼓励下，有时却能清晰地低咏少年时学会的校园歌曲《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音很准，一字不差，听来很为亲切，我想他是用他的乐观情绪来安慰至亲好友。每次探望他回来，都不禁感慨万千，引起我绵绵的回忆……

我与宝权相识已有 70 个年头了。我们相处的日子虽不多，但我们之间的情谊是深厚的。

宝权是我的表哥，他大我三岁。最初认识宝权，是在 1929 年前后，那时他正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每逢周末，他都去他的二叔戈公振先生家。公振先生是我的二舅，我也常去他家。因此，我和宝权就常见面了。那时我才 13 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勤奋俭朴的人。他到二舅家不是和二舅研究学问，就是看书，说话很少。由于我年幼失学，他很同情我，愿意帮助我，鼓励我补习中学课程，说将来可以在上海上学。他见我喜欢音乐，很热心地教我吹口琴，并把当时著名的口琴家王庆勋编写的《口琴吹奏法》送给我。书中的口琴曲，完全由宝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誊写制版的，字体和音符很小，但写得非常工整清楚，是费了很大功夫的，他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种抄谱工作，也是他勤工俭学减少家庭开支的一种办法，这便鼓励了我早日参加工作的决心。这本《口琴吹奏法》中，也有少量的中国曲子，但主要是欧洲名歌剧的咏叹调以及其他外国乐曲。我接触西洋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宝权是我学习西洋音乐的启蒙老师。

1930 年，为了养家糊口，应我的请求，戈公振先生介绍我去上海申报馆当练习生。从此，我与宝权哥就很少见面了。1935 年 2 月，在戈公振先生的安排下，梅兰芳先生率领的京剧团赴苏联演出，宝权作为《大公报》驻苏记者，正好陪同梅先生同船赴苏。他带着一本俄文字典，在船上边学习、边工作，帮助梅先生做些翻译工作。谁也没想到他后来竟成为俄文翻译大师。

自那时起我们就天各一方了，一直到 1949 年 9 月，我和中国青年文工团在布达佩斯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后，苏联共青团中央邀请我们全团同志到莫斯科参观学习，我才在莫斯科见到宝权，这距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 15 个年头了。

这15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时期。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少年，在上海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启发，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同时，也进入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十分深邃的世界，一个战火纷飞，为民族存亡拼死搏斗的艰险世界，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光明大道的神奇世界。在这十几年中，宝权不仅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积极从事抗日和民主的革命斗争，而且他还从俄罗斯等欧洲的伟大作家、文学巨匠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等作品中窥见了更为广袤的天地，发现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又一座巨大宝库。他不仅自己陶醉在这与中华文化迥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而且他下定决心要很好地把他所了解的外国优秀的文化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热情传播这些表现了伟大的民主思想、爱国精神和革命豪情的文艺珍品。因此，他日夜辛劳，精心翻译、出版了大量译著。这对于正在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是大有裨益的。当时有不少青年人，正是从一些苏联进步文艺作品中得到启发和鼓舞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9年9月，新中国还未正式宣布成立，还没有设立驻外使、领馆。以新华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派驻莫斯科的宝权，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委托，作为新中国的一名外交人员代表，准备接管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当时我正随中国青年文工团访苏，是宝权协助苏联共青团中央接待我们，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详细向我们介绍情况，重要场合他亲自担任翻译。如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接见文工团时的谈话，就是他临场进行翻译的。他那么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一派学者风度，没有一点“官气”，这使我联想起他在上海读书时的那种谦和的态度，那时他已是学有所成的莘莘学子，现在他是一位翻译大家、一位著名的记者，而且在苏联负有重要的使命。身份大不相同了，可他还是那么虚心，那么热心，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他和我虽然多了一层亲戚关系，但他处理得当，也并不显得特殊。

1951~1952年间，我率领160余人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再次前往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因为苏联地域大，演出任务重，其他东欧国家又急着要中国青年文工团尽快前往演出，经我使馆与苏方商定，文工团演出分两次在苏联进行。由于我们团许多文艺人员是从延安出来的，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面临着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繁重任务，迫切要求提高个人的业务素质。因此，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演出对团员来说，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从古典到现代，从教学到工作，大家都想学习、吸收有益的经验，而苏联文艺又是最主要的学习对象，需要抓紧进行。为此，当文工团在波兰演出时，我抽空到苏联“打前站”，与苏联有关领导商谈演出计划，特别提出想在演出过程中多参观、多学习交流的迫切愿望。

那时，宝权已是我驻苏联使馆的首任文化参赞，是领导我团在苏联活动时的直接负责人。由于他的精心安排、亲自联系，我到莫斯科第二天就见到了公务非常繁忙的张闻天大使，张大使对我们的工作十分关怀，对学习也非常支持。很快，宝权又陪我拜会了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主席，商定了演出计划。我们提出的学习要求，经过宝权的详细说明，苏方也很热情地答应尽可能满足我们的愿望。这次，我只花了两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这和宝权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当中国青年文工团抵达莫斯科时，宝权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帮助我们安排演出的节目，审改演出节目单上的俄文译文。在苏联的整个过程中，他对我们团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一直十

分关心。他专门向全团同志详细介绍了苏联的现状及文化艺术成就，给大家许多启示。至今我还保存着记录他那次讲话的笔记本。翻阅他当时的讲话，想到他现在病魔缠身，就有种特殊的感觉。他对任何事情都是那么认真负责，从来都把自己的身心贡献给了工作，他是积劳成疾的啊！我们在苏联期间的重要参观、访问、座谈，他都陪同并进行指导。团员们观看芭蕾舞、西洋歌剧时，他都尽可能地事先详细介绍剧情，使团员能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在这次访问中，我患了感冒，医生怀疑是肺结核，被迫住进了苏联外交医院。结果肺病被排除，医院给我做了盲肠手术，这一切又是宝权亲自安排、照顾的。由于他在身边照顾，使我在异国他乡患病时，感受了一片亲情，没有一丝的寂寞和顾虑。我想，要是换成一个普通的团员生了病，他也会同样很好地去照顾的。这也是我们团里同志们的共同感受。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奉调回到国内，从事发展中苏人民友谊，加强中苏文化交流的工作。任务虽重，但他在出色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还勤奋地、不间断地抓紧时间进行译著。那时我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虽然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但隔行如隔山，平时接触并不多。那时，政治运动多，人们相处顾虑也多，亲戚之间也不能过于亲近，以免别人说是“感情小圈子”。

和宝权哥相处时间最长的是“文革”后期到现在这段日子。这也是我们相互了解比较深的日子。

“文革”期间，我不仅被打成“黑线头目”，还被诬陷为“法国特务”，列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与周扬等同志同案。1969年，被遣送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请假回京治耳病，在当年国庆节前被专案组逼回咸宁。1973年再次返京治病，被扣上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香港特务”的夫人王昆也因病从部队返回北京。当时，由于周恩来总理为我和王昆说了话，说我们没有问题，短时间内，造反派对我们看管稍微松一些。但江青一伙一贯反总理，当然不会认真贯彻总理的话，所有的帽子仍扣在我们头上，随时有挨批斗的可能。有一天，我们在街上偶然碰见宝权及夫人梁培兰，既感到意外，又特别感到欣喜。宝权对我和王昆十分亲近，问长问短，一片关怀之情。培兰也不以我们是黑帮、是审查对象而见外，两家人马上坐在一起，畅谈起来。原来，“文革”中宝权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遭罪不少，现在虽然有人身自由，却未被使用，仍靠边站。培兰出于同情，对他给予照顾，终于结成佳偶(近几年来，宝权体弱多病，多亏了培兰的精心照顾。她还为宝权收集过去的译著及照片，精心编辑戈宝权文集及画册，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感谢的)。那时宝权虽然身体尚好，但仍不健谈，总是温和地以微笑迎人，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亲切风度和乐观精神，也并不因受到打击而垂头丧气，似乎再大的压力，即使是大山崩于前，也不会动容失色。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鼓舞，一种安慰。从那时起，我和王昆常去他家看望，从如何抓紧孩子们的学习(包括语文、英语及音乐等)，如何不使时间浪费，以及我们今后生活如何安排等等，什么都谈，包括对“四人帮”许多倒行逆施的反感。对未来和前途，我们都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江青一伙总有垮台的一天，历史会还我们清白的。有次庆祝“五一”节举行游园活动，我和王昆不顾什么管制纪律，跟一位老干部到中山公园游玩，又碰上了宝权夫妇，就在一棵大树下共进野餐，谈笑风生，可以说是苦中作乐，也是对“四人帮”那些坏人的一种藐视。

这时我才知道，宝权有个绰号叫“老10级”。这也最能说明问题了。他是“三八式”老党

员，新中国成立第一次干部评级时，他作为首任驻苏临时代办，被评定为行政10级。后来每逢调工资，有时领导动员“让”，有时他主动地“让”；他成了有求必让，一让到底，直到现在仍然是“老10级”。宝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驻外外交官，又是一位苏欧文学的研究专家、翻译大师，待遇这么低，实在使我感到有些意外，亲人和朋友们对此都愤愤不平。“文革”后，我想写信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此事，他却加以阻止。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提自己的待遇问题，是向党伸手，这样不好。他参加革命工作多少年了，从未在意这些个人问题，积极工作是他惟一的人生追求。“文革”结束，他恢复工作，更是诲人不倦、千方百计努力培养人才。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936年，塞克翻译了高尔基的话剧《底层》（有人译为《夜店》），并开始有名演员魏鹤龄家对词排练，其中有个插曲《囚徒歌》，由我按曲谱把塞克译文进行了编配。前几年，我很想知道原作曲者是谁，就向宝权请教，他特地从南京图书馆取回高尔基的原著，查出原来歌词和曲谱并拿给我看，告诉我俄文书上没有作曲作者的姓名。他这种一贯乐于助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钦佩。由于他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方面的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不少国家邀请他去访问、讲学，苏联、法国等国还给他颁发奖章和荣誉称号。对这一切，他也从不骄傲自满。为了促进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更多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他把自己毕生收集珍藏的2万册中外文藏书捐献给江苏省，存放在南京图书馆（其中，最珍贵的有原版91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等外文书籍，有些书至少在当今中国都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孤本），表达了他对祖国、对家乡、对文化发展的一片赤诚和奉献之情，受到了家乡人民和专家学者的赞扬和崇敬。

我和宝权相处的时间不多，因为从未在一个单位工作、学习过，他的译著读过一些，也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对他的了解不如有些同志深刻、全面，但对他总的印象还是清晰的、肯定的。

他谦和善良，没有丝毫恶气；

他博学多才，没有丝毫骄气；

他乐于助人，没有丝毫傲气；

他不断求进，没有丝毫暮气；

他身居要职，没有丝毫官气；

他胸怀豁达，没有丝毫怨气；

他不求名利，没有丝毫俗气；

他经历坎坷，没有丝毫馁气；

他是一位学者，一位长者，一位仁者。

他的人品、文品，他的成就，他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祝他早日康复，颐养天年。

1999年9月9日北京

关于叔父戈公振先生及对戈宝权的启蒙



戈公振先生

戈公振(1890—1935年)是戈宝权的叔父,他出生在东台县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自幼聪慧、勤奋好学,23岁时就到上海谋生,先在有书局当学徒,次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直升到总编辑,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为我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一生追求进步,热爱祖国。不顾自己的安危,和邹韬奋等人筹办《生活日报》,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5年10月15日,从苏联回到上海参加抗战,但于10月22日就离开人世,他的死因直到今天始终是个谜。戈先生去世后,邹韬奋负责编成了《从东北到庶联》一书作为纪念。他著的《中国报学史》前几年在国内、台湾再版。戈宝权一生受戈公振的影响很深,沿着叔父所走的爱国主义道路奋斗着。1985年,由文化部等六个单位联合举行戈公振纪念会,现将胡愈之先生的讲移录于如下: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纪念戈公振先生诞辰95周年和他逝世50周年。他的生命仅仅45岁,但他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而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20年代、30年代著名的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不只是个优秀的新闻记者,而且是我国早期新闻学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为我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914年起,戈公振先生开始走进新闻界,在上海《时报》从校对、助理编辑到总编辑,勤